

圖3：龍舟及載著神像的神艇穿過打開了的木橋。(廖迪生攝，2011)
 Figure 3: Dragon boat, towed the sacred boat loaded with the traveling deity images, passed through the open wooden bridge (photograph taken by LIU Tik-sang, 2011).



圖4：從洪聖廟接出神像。(廖迪生攝，2010)
 Figure 4: A traveling deity image was taken out from the Hung Shing Temple (photograph taken by LIU Tik-sang, 2010).

17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傳與保育 ——以長洲島的太平清醮為例

蔡志祥、馬木池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Examining the Direction of Preserving
 Hong Ko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of Hong Kong Cheung Chau's Jiao Festival

CHOI Chi-cheung & MA Muk-chi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傳與保育

——以長洲島的太平清醮為例

蔡志祥、馬木池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立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需根植於相關社區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歷史中，扮演一個可以作為社區認同的手段的角色。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裡登錄的物質文化經典作（masterpiece）中，大部份與節日慶典有關。節日慶典一方面體現了公眾的、傳統的展演方式，另一方面確認了文化展演的空間。他同時是實在的、物質的表演；也是抽象的、非物質的觀念。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傳與保育，必須是與人群相關的時間和空間的考量，也必須兼顧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元素的互動。長洲島的太平清醮，可以提供這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些思考。

一、長洲島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簡稱香港），位於珠江口以東，而長洲島則位於香港島西南約16公里，面積約3平方公里。它由南、北兩個高約百米的小丘，並由連接兩者之間的一條狹長的沖積平原所構成。長洲島與珠江口相近，船隻出入便利，所以長洲與漁業有關的商業十分興盛，如船廠、山貨、雜貨店等，均以供應漁民需要為主。早在乾隆時期，長洲已是新安縣的重要墟市之一；²同時亦是附近各島嶼魚獲的集散地，為香港主要的漁業中心，島上居民以捕魚和從事與漁業有關的各式行業為主。全盛時期，島上有船廠、修船廠及槳櫓廠，共24家之多，加上漁絲廠、漁鈎廠，以及曬鹹魚、

1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Proclamations 2001, 2003, 2005. Published by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Section, UNESCO Culture Sector, Paris, June 2006.*

2 據長洲社天后廟乾隆五十年（1785）的香爐銘文，當時長洲已稱墟。在嘉慶新安縣志，亦已把長洲墟列為新建墟。見嘉慶《新安縣志》，1979年王承業重印，頁32。科大衛、陸鴻基、吳倫覽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頁678。

製蝦糕等食品加工業。1970年代，隨着香港漁業的衰落，島上居民生計深受影響。1980年代末，島上的紡織、皮革、塑膠、食品加工等輕工業亦相繼結束，年青島民只好遷居市區謀生。今天，長洲島的經濟主要依靠旅遊業的發展，為香港旅遊消閒的熱點之一。

長洲在二次大戰前，實行街坊總理制，由街坊選舉總理四人，任期兩年，每年四季，每季由一位總理代理地方事務。日軍佔領期間取消總理制，成立維持會。維持會在戰後取消，地方事務交由居民協會及華商會先後負責。1961年得香港政府的理民府協助，由全洲居民選舉代表，再由代表互選委員，成立長洲鄉事委員會，作為溝通官民的地方管理組織。1982年香港政府施行地方行政改革，分區成立地區議會。現今，長洲島居民約23,000人，是香港人口最稠密的離島。依據香港的地區行政劃分，長洲島屬於全港18個區議會中的離島區議會。

長洲的舊市集範圍主要在島中間的狹長沖積帶上，包括北社、新興、大新、中興和興隆五條街和與各街平行的後街。以往，長洲島上各族群都各自聚居，如惠、潮人主要聚居在北社街和新興街，廣府人則在大新、中興和興隆街，廣府人聚居的三條街，也是島上的商業中心，主要的金鋪、茶樓、銀行和街市都集中於此，而被稱為「蛋家人」的水上居民，主要集中在西南端的西灣。每年農曆四月，全島居民共同參與的太平清醮，就是在市集範圍內舉行。

長洲島在20世紀前已有四個同鄉會，其中「惠潮府」可算是島上最早的同鄉會，以其名義創建的「北帝廟」，據說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惠州商人從廣東陸豐玄武山把北帝香火帶到長洲，並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由惠潮人倡議創建的廟宇。雖然，長洲島的北帝信仰始於海陸豐人，但在20世紀初，惠、潮人士擴建廟宇時，得到廣府人的經濟支持。自此，惠、潮、廣府三族群平分北帝廟的祭祀和控制權，輪流負責每年的神功戲。北帝亦逐漸被長洲人接納，成為全島人的保護神；以北帝為中心的太平清醮，也被視為每年全島居民共同參與的最重要的活動。

二、長洲島的太平清醮

有關長洲太平清醮的起源，有多種不同的傳說。據老一輩惠州籍人士的回憶，長洲太平清醮始於香港島的太平山街。大約在19世紀末，由於人口稠密的香港島太平山街地區發生鼠疫，造成很多人死亡。此時，該區有一位海陸豐居民將家中供奉的北帝神像拿到街上，供各居民上香禱告，果然使

瘟疫平息。自此，居民每年以北帝為中心，在太平山街舉行清醮儀式，禱災解厄，超渡亡魂。後來，香港政府為加強防火安全措施，禁止居民在太平山街舉行太平清醮，居民遂將活動移往同樣為海陸豐人聚居的長洲島北社街舉行。觀乎歷年長洲太平清醮的會景巡遊可證長洲太平清醮與太平山街的關係，巡遊行列都是由太平山海陸豐人的北帝乘坐的神輿帶領，喃嘸師傅及島上其他神祇隨後，並以長洲北帝殿後。考太平山街會分別於1854年和1894年發生鼠疫，故長洲太平清醮的起源已超過百年。³

長洲的太平清醮作為驅瘟逐疫、許願酬神、祈求闔境平安的社區節慶活動，於每年農曆四月上旬舉行，醮期三天。按舊有的做法，醮期是每年正月十五後，在北帝神前卜決定。大會聘請來自海陸豐的喃嘸師傅，執行醮儀。在太平清醮前一天，北社街和新興街居民進行洗街儀式，潔淨社區後，便由太平山北帝、北社天后和北社北帝三位神明先在北社街、新興街與後街巡遊，巡遊完畢，便可把牠們安放在神棚內，接着才把其它神祇請到神棚。沒有神明能先於這三位神祇被安放於神壇，它們亦只在惠潮人聚居的三條街上進行洗街與巡行，顯示了長洲太平清醮與惠潮人士的特殊關係。在正醮開始前，豎立九枝幡竿，確建建醮範圍。在幡竿劃定的範圍內進行淨香儀式，確保醮場的潔淨。傍晚喃嘸舉行淨壇、開光，午夜前舉行啓壇儀式，代表着醮會的正式開始。醮期內，喃嘸每天會代表居民，早、午、晚作行朝拜儀的儀式，向神明懺悔，祈求寬恕鄉民過去所犯的罪孽。

第二天中午「走午朝」，喃嘸帶着祭品，繞行於五張代表五方的桌子，象徵向五方神明供奉食物和衣服。長洲作為漁業社區，海上安全也極為重要。因此，第二天晚上進行的「祭水幽」，正是針對居民的需要，由喃嘸乘船在長洲灣外圍來回巡遊，誦經超渡海上死難者，將祭品拋到海裡，施贈及安撫亡魂。在祭水幽的同時，醮棚內進行「迎聖」的儀式，邀請玉皇大帝及各神明到醮棚享用祭品。

第三天早上舉行「遣船」儀式，由喃嘸命令紙扎的功曹使者將滿載代表不潔物的紙船和代表「厄運」的鴨放到海上，象徵把污穢和厄運送走。接着

3 本文有關長洲太平清醮的歷史淵源和基本內容，主要參考蔡志祥，〈香港長洲島的神廟：社區與族群關係〉，載於陳春聲、鄭振滿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Chi-cheung Choi, "Reinforcing Ethnicity: the Jiao Festival in Cheung Chau", in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eds. David Faure and Helen Si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4-22。

是「頒符」，喃嘸以雄雞血畫於符紙，讓鄉民領回家中，貼於門前及廚房，或者隨身攜帶，以保平安。中午，進行「會景巡遊」，以太平山北帝為首，隨後是島上八間廟宇的神明，接着是喃嘸、島上各街坊會和地方社團組織的巡遊隊伍，並以長洲的北帝殿後，組成龐大的巡遊隊，在建醮範圍內巡行，安撫幽魂野鬼，使疫病得以清除。當巡行隊伍接近大新街的洪聖廟時，洪聖會被匆匆送回廟裡；行列到達大石口天后廟時，喃嘸會進行放生。在回程時，參與巡遊的街坊社團的隊伍，會自行返回所屬會所，抬神輿者則會競跑回神棚，稱「走菩薩」。據說最早將神輿送回神棚的團體，來年會得好運。長洲各街坊社團為壯大巡遊的聲勢，招集街坊居民舞獅、舞麒麟，在巡遊隊伍中加入八音鑼鼓。20世紀初，更由佛山引入飄色。今天所見的會景巡遊，還包括潮州的英歌舞、西方的銀樂隊等。

晚上「祭大幽」，將負責監管游魂野鬼的「大士王」（俗稱鬼王）放置於空地上，配以36席祭祀用的齋菜，由喃嘸代表居民施贈祭品給游魂野鬼，並藉喃嘸的法力，超渡他們。儀式完結後，大士王以火化方式被送走。太平清醮的目的為驅瘟逐疫，分衣施食，超渡亡魂。因此，「祭大幽」是每年打醮儀式的高潮。作為祭品的三座大包山上的包，因曾經喃嘸誦經作法，被居民認為能保平安，在祭大幽儀式後，便蜂擁而上，開始「搶包山」活動。1978年，政府以包山倒塌，造成多人受傷，禁止再進行搶包山。大會只好改用長鈎將包從山鈎下來，待天明分發給居民。自禁止搶包山後，長洲各街坊屢次提出恢復此傳統活動的要求。2005年，香港政府為重振亞洲金融風暴後頹敝的經濟，推動香港旅遊業的發展，答應長洲各社團領袖及離島區議會的要求，在附加各項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有限度恢復搶包山活動。如今，身繫安全繩的運動健兒，奮力爭奪塑膠平安包的場面，正是由此而來。深夜時，所有紙扎神像會被火化；接着，島上居民會帶備三牲祭品到神棚祈福許願。

翌日下午，進行第二次會景巡遊。巡遊過程中，神明被送回各廟宇。當天午夜，開演神功戲，按例演海陸豐白字戲。隨着神功戲的結束，太平清醮亦宣告完成。

三、人與承傳

節日的延續，我們可以從組織者和文化展演者兩方面理解。一直以來，長洲太平清醮的行政組織為「建醮值理會」。在1960年代以前，建醮值理嚴格規定必須為惠潮府的會員。每年正月十六日，由長洲惠潮府同仝，

同上屆總理，擇日在北帝殿前杯卜，卜選當年總理。每位值理可擲杯十次，得勝杯最多者為總理，次為副總理，勝杯數目相同者，可同時當選，故每年正、副總理人數不定。初期，由正、副總理主持太平清醮的各項籌備工作；後來，因建醮工作繁重，非正副總理數人之力量可以勝任。故將建醮工作制度化，設總務、財務、募捐、募財、法事、演劇、神壇庶務、會景巡遊、公共關係、宣傳及文書等部，分別選聘各值理負責。同日，剛選出的正、副總理在北帝神前卜杯的方式，擇定農曆四月份的建醮日期。由此可見，惠潮府會員作為組成建醮值理會的來源，在籌辦長洲太平清醮的活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惠潮府的理、監事，亦可說是每年建醮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和醮事的主要傳承人。直至2004年，建醮值理會在北帝神前卜杯決定，改變這種每年臨時組成「建醮值理會」的方式，改以社團註冊的方式，成立永久的「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作為舉辦長洲太平清醮的常設機構。值理會招收會員，不再有籍貫的限制。值理會經全體會員選出13人為執行委員會，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但仍依照傳統，每年在北帝神前卜杯正、副總理，選出的正總理為當年值理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副總理為當年執行委員會委員。

20世紀初以來，惠潮府的主要負責人如下：

- (一) 方平：潮州人，生於1904年，卒於1999年。在二次大戰後，任惠潮府理事事長超過30年。
- (二) 羅天恩：海豐人，生於1906年，卒於1992年。戰後一直擔任惠潮府副理事及理事。
- (三) 馮玉書：海豐人，生於1912年，卒年不詳，任惠潮府常務理事多年。
- (四) 馮北泰：海豐人，生於1917年，卒於2007年，曾任惠潮府常務理事兼財務主任多年。

2004年後，醮的主辦單位由惠潮府主導的「建醮值理會」改組為「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由翁志明任主席至今。從長期的歷史來考察，這一發展，顯示太平清醮，由島上的特有族群的慶典，發展為代表全島的節日。也就是說，節日的空間擴展，與歷史的流程息息相關。

百多年來，長洲島居民為驅瘟逐疫，保境安民，一年一度舉辦太平清醮，從未間斷。節慶的豐富傳統內涵，在居民持續多年的參與中，得以傳承發展。全島居民藉着籌辦此慶典聯結起來，建立社區認同。每年建醮也是長洲居民集中展現其多姿多彩的民俗傳統的場所；如紙扎神像、扎建包山、手製包點等民俗工藝，加上民間道教儀式和音樂、飄色、舞獅、舞麒麟、大

鑼鼓等民間表演藝術。節慶活動的參與者，年復一年，用以長帶幼的方式，將累積的寶貴經驗傳給下一代。因此，長洲太平清醮是與島上居民的社區認同，日常生活有緊密聯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縱使如此，我們仍然需要明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間脈絡的重要性。

太平清醮也包括了多項的傳統技藝：

(一) 紙扎用品：紙扎作品中，最重要的是大士王、土地、山神三位高約五米的大型神像。建醮大會一直堅持聘用海陸豐的紙扎師傅，扎作海陸豐傳統風格的神像。據二次大戰後一直為長洲太平清醮做紙扎的黎恒祥師傅說，海陸豐人所做的大士王，與其他族群所做的不同。廣府人做的大士王是坐着的，潮州人做的大士王是雙腳站立在地上的，而海陸豐人的鬼王則是一腳獨立，一腳懸空抬起的。這種造像有兩個作用，首先，居民都相信假如他們在大士王抬起的腳下繞過，可以得到鬼王的護佑，免受邪靈的侵擾。其次，人們亦相信在大士王抬起的腳上撕下的小紙片，拿回家中燒成灰，混入茶中飲用，會得到鬼王的保護。

(二) 包山：由地方社團捐建的三座大包包山，已成為長洲太平清醮的象徵。外文著作多稱長洲太平清醮為「Bun Festival」（包山節）。今天，香港旅遊發展局對外宣傳時，亦以搶包包山、會景巡遊作招徠，稱其為「包山節」。一直以來，包山都是由長洲島上的居民以傳統民間扎竹工藝搭建，材料主要是大茅竹（大毛竹）和杉木，以杉木做腳，用竹搭建成圓錐體的包山架，在其上掛滿一串串的平安包。

(三) 平安包：每年長洲島上的包餅店，以傳統的手工作方式製作平安包。三座高18米的大包山，依據傳統，一斤四個平安包，每座包山約需十擔包，十擔便是四千個，三座大包山共用一萬二千個；再加上其他地方團體供拜祭用的小型包山，每年太平清醮，共需數萬個平安包。

(四) 飄色：在太平清醮第三天中午的神祇巡遊街道時，各街坊團體為壯大巡遊隊伍的聲勢，加入舞獅、舞麒麟、八音鑼鼓等，增添熱鬧氣氛。據說1920年代初，北社及南社的長者從廣東佛山引入飄色製作，各街坊團體相繼仿效，組織飄色隊，加入會景巡遊。初期，飄色的主題主要是民間故事人物；其後，加入反映社會問題的角色。每年，各街坊團體的飄色隊都絞盡腦汁，各出奇謀，設計具風格的飄色，務求吸引各街坊及遊客的注意，使會景巡遊成為每年長洲太平清醮最受矚目的項目之一。

撇除節日的宗教的和神聖的部份，巨大的神像和包山是長洲太平清醮的最重要的文化符號；搶包包山和會景巡遊是代表節日的最重要的活動。因此，

當長洲太平清醮在外文的名稱為「包山節」（Bun festival），節日的紀念刊強調會景巡遊。然而，在節日的歷史過程中，不僅參與的人群組合不斷地重整，這些文化符號和行為也因為宏觀的因素而不斷地被修正。如神像的製作是一種物質文化的展演，自從1984年黎恒祥師傅去世後，長洲島的神像製作先後由黎氏的徒弟和中國陸豐縣的師傅承擔，神像的大小、比例也較前失去均衡。同樣的，1978年因為包山倒塌，香港政府禁止搶包山，這個具備代表性的活動也因之停止舉行。具有儀式意義的包，在正醮的翌日，以分派的形式，送到居民手中。2005年在政府和地方精英推動下，以限制參與人數的競技方式，恢復「搶包山」的活動。然而，這個時候的包山是用鋼筋建成的，「包」也轉為塑膠製造。作為長洲島會景巡遊的主要特色的飄色，不僅是1920年代導入的新的文化展現，而且為香港其他地方（如石澳1986年以來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借用。也就是說，物質文化或文化的展演，因為人群、社區的歷史過程而變化。沒有人、沒有社區的話，節日是死的、表演是空虛的。人和社區是活生生的。故此，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節日是變化的、有生命力的，代表各時代的社區人群的創造力的。在這樣的考慮下，我們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不是保育文化的虛殼，而是保育富有生命力、創造力的社區和人群，記錄他們如何在每一個歷史時空中，體驗和展演其生活。在這樣的考量下，我們提出下列的保育計劃。

四、保育的建議

隨着香港漁業和輕工業的衰落，旅遊業成為長洲的經濟命脈。年青一代為謀生計，多遷往市區居住。長洲太平清醮無可避免地要面對資源缺乏，規模日漸縮小，儀式日益簡化的困境。近年，香港旅遊發展局將傳統節慶列為重點宣傳項目，向海外大肆宣傳長洲太平清醮。為吸引海外遊客，營造「嘉年華」式的節日氣氛，而突出助慶的會景巡遊，重點介紹飄色和競賽式的「搶包山」，卻忽略了節慶為驅逐疫、酬神許願及建立社區認同的內涵。因此，外部資源的投入，政府的參與，不但未能讓市民大眾和海外遊客認識長洲太平清醮，甚至會造成誤解與歪曲。

長洲太平清醮本來只是海陸豐人的節慶活動，後來演變為全島居民的節日，這過程讓我們了解到文化傳統本來就會因應社會環境和社群關係的轉變而變化。其變化正是參與者創造力的表現，但他們若未能認識其發展的來龍去脈，此節慶活動便會失卻傳統和歷史感。由於過往對長洲太平清醮缺乏有系統的記錄和研究，使這項彌足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失卻傳統的危

機。因此，自2004年成立永久的「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後，常設的値理會變更舊法，決定每年於政府法定假期舉行會景巡遊，方便居民參加慶典。又擬訂計劃，邀集專家學者，對長洲太平清醮作深入的研究，追溯群體認同的變化過程；通過不同的媒體，有系統地記錄此節慶在不同時期的展示，以出版各類影像向公眾介紹，讓社區內的年青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有確切的認識，培養他們的社區歸屬感，進而肩負起傳承的責任；也期望望社區以外的人士，在參觀飄色和競賽式的「搶包山」時，亦不致於誤解此項非物質文化的意義。

我們認為保育的重點在於透過研究，理解不同歷史時空的文化核心；我們也認為人羣的世代參與是學習文化的最佳方法。我們因此建議成立「長洲太平清醮保育計劃委員會」。委員會主要由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長洲鄉事委員會及惠潮府有限公司、長洲各街坊及社區組織選出代表，加上對香港地方民俗文化素有研究的學者和政府文化部門相關官員組成。為長洲民俗文化生活的保育提供意見，協助推行以下的五年保育計劃。我們也同時建議保育分為研究和體驗兩部份。

研究方面，以「長洲太平清醮研究計劃」為主體。這計劃分兩部份：

(一) 地方文獻及檔案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計劃。邀請對香港地方傳統民俗文化素有研究的學者，主持此計劃，進行全面的文獻、圖書和檔案資料的搜集，建立資料庫，為學術研究作出長遠的貢獻，亦為籌辦「長洲民俗館」作事前的準備。根據所搜集的資料，進行學術研究。計劃的第二年，舉辦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吸引更多學者參與本土民俗文化的研究。計劃的第三年，根據已有的深入研究，撰寫能兼顧學術與普及，有關長洲太平清醮的專書，向普羅大眾介紹長洲的歷史文化和太平清醮的內涵與演變。成果包括出版兼顧學術與普及的《探索長洲歷史與文化》一書，扼要介紹長洲的歷史，居民生活與太平清醮的內容與意義。

(二) 「長洲社區傳統文化生活」口述歷史計劃。以口述歷史研究的方試，對長洲太平清醮活動的重要組織和參與長者，及各項民間工藝的主要傳承人，進行深度訪談，記錄其回憶，撰寫其生命史。有關各項民俗傳統的內容，工藝的傳承為重點記錄的內容。從「口述歷史計劃」選取較重要及完整的長者生命史，編輯出版《集體回憶：長洲太平清醮與社區生活》。此書將有助於長洲太平清醮的各項民俗傳統及工藝的保護，並希望能引起年青一代的興趣，從而投入學習，擔負傳承的責任。除據上述的調研工作所得資料，進行整理，建立存儲資料的檔案系統外，分階段出版《長洲太平清醮文獻叢書》。

體驗方面，主要集中兩部份：

(一) 籌備成立「長洲民俗館」。以長洲太平清醮的歷史發展為主軸，展示長洲居民的社會文化生活、各種民間工藝。讓島上年青一代，對傳統生活習俗有更深的了解，加強對社區的歸屬感，從而更願意投入社區生活，使太平清醮等社區傳統節慶活動得以維持。讓有興趣到來參觀活動的廣大市民及海外遊客，對長洲地方社會的歷史、文化有所認識，於參觀太平清醮時，能理解此節慶的內涵，獲得更深層的趣味。我們建議設立「長洲民俗館」，並發起徵集文物及資料的活動。

(二) 「長洲民俗文化工作坊」。邀請製作飄色、包山、平安包的師傅，講解其工藝的特色，並作示範；教授舞獅、舞麒麟等基本功。進行飄色設計和小型包山扎作比賽。長洲現有六間小學、三間中學。每年農曆新年後，邀請長洲島上各中、小學，參加「長洲民俗文化工作坊」，鼓勵學生參加會景巡遊活動，嘗試設計飄色，參與舞獅、舞麒麟，讓他們從參與中學，培養其社區歸屬感。

我們認為文化保育必須平衡下列三者：

- (一) 與有關政府部門協商保護措施：與香港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屬下負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責部門緊密接觸，商議及制訂合適的保護措施，確保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長洲太平清醮，得到適當的保護。
- (二) 確保保護計劃有充足的資金：以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為首，與長洲鄉事委員會和長洲惠潮府有限公司合作，向各政府有關部門申請撥款，向各學術文化基金會，申請研究經費，在民間推動籌款活動，確保上述五年保護計劃，得到充裕的資金。
- (三) 有系統地搜集和整理資料，建立資料庫：邀請對香港民俗文化素有研究的學者主持有關長洲太平清醮的研究計劃，全面搜集與長洲太平清醮有關的資料，進行系統的整理，建立資料庫。透過出版書刊及展覽，讓公眾了解長洲太平清醮的文化內涵，不致出現誤解與歪曲。

五、小結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空間，實踐其文化生活，通過實質的生活、標記、表演方式，表現其世界觀，顯示其創造力。長洲的例子告訴我們，文化是活的遺產而非死的遺產。明白人羣和社區是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調整的話，才能有效地保育文化。

Examining the Direction of Preserving Hong Ko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of Hong Kong Cheung Chau's Jiao Festival

CHOI Chi-cheung & MA Muk-chi

Summary

Most items listed as masterpie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registered by UNESCO, are related to festivals. By "festivals" we mean the public display of tradi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space in which culture is represented. The time and space relevant to peopl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elements must be considered when the subject concerns the transmission and preser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heung Chau Jiao Festival can provide a good example.

Cheung Chau Island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Hong Kong Island, close to the mouth of the Pearl River. Thus, it developed a prosperous industry for fishing and related businesses. However, the living status of Cheung Chau's residents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Hong Kong fishing industry in the 1970s, and by the late 1980s, young people were forced to go to urban areas of Hong Kong to earn money. Today, the local economy of Cheung Chau is highly dependant on tourism.

The old market of Cheung Chau includes Pak She Street, San Hing Street, Tai Hing Street, Chung Hing Street, Hing Lung Street and the backstreets running parallel to these five streets. Both Hui Zhou and Chaozhou people reside in Pak She and San Hing Streets while Guangfu people live in Tai Hing, Chung Hing and Hing Lung Streets. The boat people are centered in Sai Wan, in the extreme southwest corner of Cheung Chau.

It is said that the Cheung Chau Tai Ping Qing Jiao was originally held in Taipingshan Street on Hong Kong Island to eliminate plague.

The purpose of the Jiao festival was to purify the community and make sacrifices to the god (focusing on Pak Tai) for greater peace. This three-day festival is held every year within the old market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fourth lunar month.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Jiao Festival was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Jiao Construction" whose members were the Huizhou and Chaozhou people. In 2004,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Jiao Construction" was replaced by the "Cheung Chau Tai Ping Qing Jiao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Hong Kong" whose members were not restricted by their place of birth.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Tai Ping Qing Jiao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festival representing a specific ethnic group to an activity for all Cheung Chau residents.

Alongside the religious and holy parts of the festival, the giant god statues and bun towers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Cheung Chau Tai Ping Qing Jiao. The bun scramble and the parade of deities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ctivities within the Tai Ping Qing Jiao. However, both participants and cultural symbols have continuously chang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For instance, the bun scramble was bann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because bun towers once fell down in 1978. In order to develop Hong Kong tourism, in 2005 the government and local elites promoted the holding of the new bun scramble, resulting in its recovery as a competition. Under this situation, both the religious meaning and the function of building community identity represented by the original bun scramble were ignored. The investment of outside resource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ould no longer instruct common citizens and overseas tourist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eung Chau Tai Ping Qing Jiao Festival. Therefore, the display of the festival varies in concert with the changing people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mmunity.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festival, as an exampl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indeed be the preservation of an energetic and creative community and its people.

Based on the case of the Cheung Chau Tai Ping Qing Jiao, we suggest that the focus of conserva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enter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 and spaces. As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generations is the best method to learn the culture, we propose to establish a "Cheung Chau Tai Ping Qing Jiao Preservation Plan Committee" which should be composed of the Cheung Chau Tai Ping Qing Jiao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Hong Kong, the Cheung Chau Rural Committee, the Huichao Limited Company,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entire neighborhood and from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of Cheung Chau. The committee should also include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Hong Kong folk culture and officers of relevant cultural department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conservation should include both research and activity. The research part has two segments. The first is the collection of and research plans for local archival documents. The second is the oral history plan for collecting the recollections of "Cheung Chau traditional cultural life". Regarding the activity aspect, this should focus on establishing the "Cheung Chau Museum of Ethnology" and the "Workshop of Cheung Chau folk culture." Furthermore, we argue that cultural preservation should balance the following three respects: negotiation with relate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for the means of preservation, the ensuring of abundant funding to support the preservation plan, and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and sorting of documents and the creation of a 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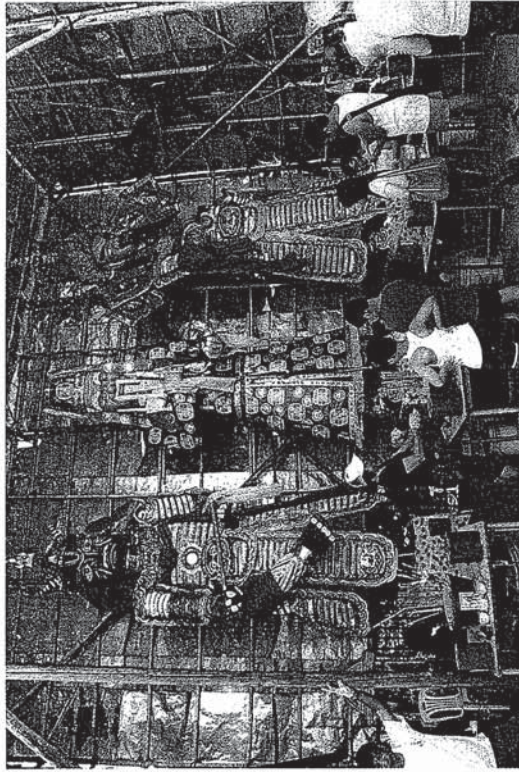


圖1：作為長太平清醮像徵的三大神：鬼王、土地與山神。(馬木池攝，2011)
 Figure 1: Images of the three principal deities: the Ghost Master, the Earth God and the Mountain God (photograph taken by MA Muk-chi,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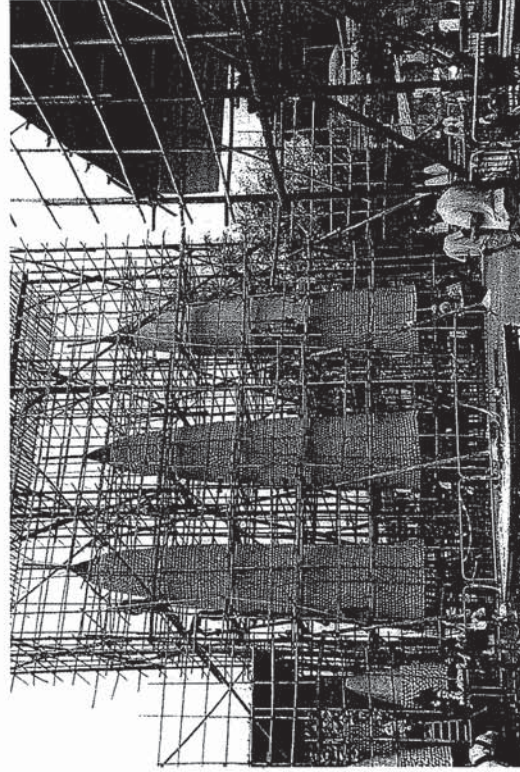


圖2：包山製作。(馬木池攝，2011)
 Figure 2: Building the bun towers (photograph taken by MA Muk-chi, 2011).

非物質文化遺產象徵邊界的移動
 ——中國廣西中越邊境京族哈節的個案研究

張兆和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The Shift of Symbolic Boundaries
 arou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ase of the Jing Minority's *Hat* Festival
 o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in Guangxi, China

CHEUNG Siu-woo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